

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 从生产率差异到创新差异

王海燕¹, 康志男¹, 郑秀梅²

(1.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9;

2. 中国民航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天津 300300)

摘要: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实行国际化战略的主要途径。以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回归方程, 探讨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高于出口企业。同时发现既然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企业选择不同的国际化战略, 那么不同的战略选择也会使得企业创新水平产生差异。于是, 基于知识流动视角, 通过对知识传递过程的分析, 并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相对于出口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 国际化战略; 生产率悖论; 创新绩效; Probit 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4)09-0124-08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companies: From productivity difference to innovation difference

WANG Haiyan¹, KANG Zhinan¹, ZHENG Xiumei²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2.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Export and OFDI are the two main ways for companies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takes related listed companies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n constructs regression equation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ductiv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OFDI enterpris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xport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xport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FDI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re than the expor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productivity paradox; innovation performance; Probit mode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收稿日期: 2022-03-14 修回日期: 2024-07-25

作者简介: 王海燕(1973—), 女, 河北承德人,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开放的程度。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大至国家,小至企业,关起门来自主创新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发展动能。因此,我国企业纷纷将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这两种主要的国际化形式^[1-5]在全球范围寻求先进技术,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6]。基于此,本文就这两种国际化战略展开探讨。

对于企业如何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战略中选择,Helpman等^[7]发现生产率最高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次之选择出口贸易,最低为内销,这也是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结论之一。然而,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选择是否遵循上述规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出口似乎是开放程度更高的一种国际化方式,是否意味着生产率更高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比出口企业能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创新绩效更高?本文将以此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 生产率差异

目前,国内外文献大多集中于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内销企业的生产率差异研究。关于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比较,也即出口和内销的战略选择(图1中的关系“1”),有研究^[8-10]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低的选择内销,符合Helpman等^[7]的模型结论。但李春顶等^[11]发现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内销企业,与Helpman等^[7]的模型结论相悖,将这一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而对于企业内销或对外直接投资

的选择(图1中的关系“2”),多数研究^[12-15]支持Helpman等^[7]的结论,即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

那么,中国企业对“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次高的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结论(图1中的关系“3”)是否适用呢?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悖论”呢?对此,本文基于Helpman等^[7]模型,检验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生产率与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关系,提出假设1: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低的选择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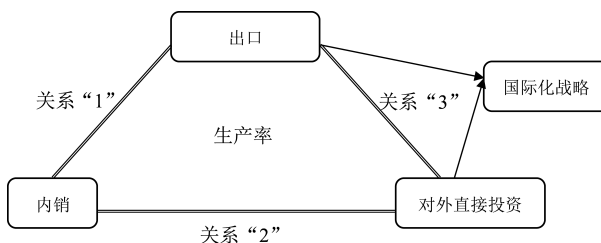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化战略与生产率关系

(二) 企业国际化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

如果假设1成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出口企业,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比出口企业更能有效配置资源(包括知识和人才),那么理论上也能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本文基于知识要素流动视角,对此进行检验。

对实行国际化战略的企业而言,新知识的来源是企业自己生产(own-generation)及来自外部的知识转移(transfer)^[16]。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际化战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因此仅关注来自外部知识转移带来的创新提升。根据Frenz等^[16]的研究,来自外部知识转移的具体来源可以分为知识购买(source 1)、与其他企业的合作(source 2)、同一家企业不同分支的内部知识转移(source 3)三种,本文沿用这一分类。

根据Polanyi(1958)对知识的划分,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显性知识是可被编码的知识,包括语言、公式、图表等;隐性知识是不可或缺

① 参考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32.htm。

被编码的知识,包括经验、技巧、价值观、组织文化等。相比较显性知识可以直接通过书本等方式传递,隐性知识只能通过“练习”和“应用”传递,不仅速度慢、代价大,而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17]。有研究表明隐性知识是提高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18-19]。结合企业外部知识传递的三种途径,显性知识的传递来源包括 source 1、source 2 和 source 3(记为“source 1-explicit”“source 2-explicit”“source 3-explicit”),隐性知识的传递来源是 source 2 和 source 3(记为“source 2-tacit”“source 3-tacit”)。

由于企业通过不同的国际化战略学习到的新技能或经验承载的新知识来源不同,因此学习到的技能或者经验不一样^[20-21]。假设实行国际化战略的企业为企业 A。若企业 A 通过出口获得新知识,进口企业为企业 B_{export},则企业 A 通过向企业 B_{export} 购买新知识(source 1)或通过与企业 B_{export} 的研发合作(source 2)获得新知识。若企业 A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新知识,东道国所在企业为企业 B_{ofdi},那么无论企业 A 是绿地投资还是兼并、收购,企业 B_{ofdi} 作为企业 A 的分支机构,均通过内部转移(source 3)实现知识传递。但与出口不同的是,在内部知识转移向企业 A 之前,企业 B_{ofdi} 作为独立法人,不仅可以实现知识自我生产,还可以与兼并或收购的目标企业或者东道国当地其他企业之间实现外部知识转移(source 1 和 source 2)。于是,两种国际化战略下企业的外部知识转移如图 2、图 3 所示。

可以看到,相比出口,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拓展了其边界范围,接触到不同的知识源,获得新知识的途径也更多,增加了学习新知识的广度^[22]。

借鉴巴克利等^[23]对信息交流过程的描述,知识交流的过程可以分为选择、加密、传递、解密、提取和使用(图 4)。在这一过程中,理解、转化和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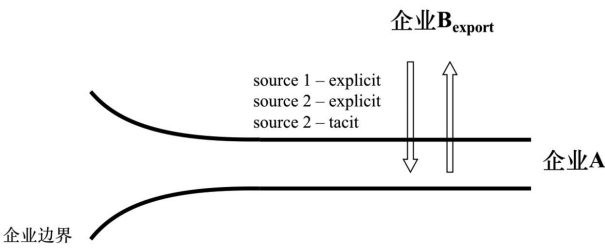


图 2 出口企业知识转移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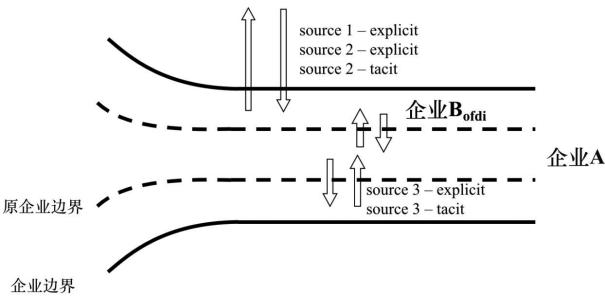


图 3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知识转移示意图

用新知识是企业创新最关键的环节。一方面,根据国际投资学的经典理论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跨国企业通过内部化市场可以节约转移成本(也称“交易成本”)。这一理论在此同样适用,即由于企业 B_{ofdi} 是企业 A 的海外分支机构,其人员构成、股权结构、组织氛围等制度环境中保有企业 A 的“基因”,因而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可以实现人员和技术的有效沟通,不仅可以缩短知识“解密”的时间,而且可以提高解密的准确性,进而更好地与企业 A 原有的知识进行整合、重组和利用。另一方面,因法律、行为习惯、信仰、文化差异的存在,企业 B_{ofdi} 和企业 B_{export} 解密知识的能力存在差异。若企业 A 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B_{ofdi} 会试图通过雇佣东道国当地员工、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交流等实现文化认同,习得更多隐性知识,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学习新知识的深度^[24],提高对知识的理解能力,有效降低沟通成本和解密知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实现知识的快速传递和转化,提高创新绩效。而企业 A 若选择出口则无法避免知识理解偏差,其对知识的利用效果大打折扣。



图 4 企业知识交流的过程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2: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比出口战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通过“制造业上市公司”(包括深市 A 股、沪市 A 股和创业板)与“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库”数据比对,筛选出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上市公司,共 1 551 家。出于数据连续性和可比性考虑,本文将样本观察期设为 201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为实行国际化战略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且通过对 CCER 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的“按地区分类的营业收入”表的比对,结合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的“海外直接投资”子数据库和商务部公示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剔除 ST、*ST、停牌中、已退市以及主要指标数据异常或严重缺失的企业后,确定在观察期内实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 241 家,实行出口战略的企业^② 141 家。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中国知识产权局官网、巨潮资讯网、CCER 经济金融数据库和上市企业官网予以补全。

(二)研究方法

1. 生产率差异研究

(1)变量选择

全要素生产率(tfp)。高新技术企业大多为资本或知识密集型,全要素生产率能有效度量技术和效率因素^[25],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生产率,更符合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的特质。

考虑到 Levinson-Petrin (LP) 方法可以有效解决 OLS 回归的内生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26],本文采用 LP 法对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C-D 函数,即 $Y_{it} = A_{it} K_{it}^{\alpha} L_{it}^{\beta} M_{it}^{\gamma}$,则全要素生产率 $tfp_{it} = \ln Y_{it} - \ln$

$\hat{Y}_{it} = \ln Y_{it} - \hat{\alpha} \ln K_{it} - \hat{\beta} \ln L_{it} - \hat{\gamma} \ln M_{it}$ 。① Y_{it} 为企业产出,用“企业增加值”衡量,且定义企业增加值 = 本期固定资产折旧 + 劳动者报酬 + 生产税净额 + 营业盈余^③。② K_{it} 为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即: $K_{it} = I_{it} + K_{it-1}(1 - \delta_{it})$ 。其中, I_{it} 为企业当年投资额。 δ_{it} 为折旧率,参照陈诗一^[27]的做法,令本期折旧率 = (本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④ - 上一年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 上一年固定资产原值。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以企业 2012 年的“固定资产净值”衡量^[28]。③ L_{it} 为劳动力,以年报中披露的上市公司在册(在职)员工人数衡量。④ M_{it} 为中间投入,参照袁堂军^[29]以及朱荃等^[14]的做法,令中间投入 = 主营业务成本^⑤ + 销售、财务、管理费用 - 本期固定资产折旧 - 劳动者报酬。

其他变量的选择具体见表 1。对于价格因素的处理,参考李春顶^[30]的做法,以 2012 年为基期,均已对相关指标进行价格平减。价格指数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表 1 变量解释与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国际化战略(<i>strategy</i>)	虚拟变量,出口企业为 1,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 0
全要素生产率(<i>tfp</i>)	对数处理
企业规模(<i>scale</i>)	对数劳动力数量
企业年龄(<i>age</i>)	企业成立年份与观测年份之差,对数处理
资产收益率(<i>roa</i>)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比率(%)
资产负债率(<i>lar</i>)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比率(%)

(2)模型建立

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对假设 1 进行回归检验,方程为:

$$\Pr(F_{\text{出口}} = 1 | X_{it}) = \beta_0 + \beta_1 tfp_{it} + \sum_{j=2}^4 \beta_j control_{it} + \lambd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i = 1, \dots, 382; t = 1, \dots, 11 \quad (1)$$

② 出口企业的业务范围包含内销,同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业务范围包含出口和内销。

③ 劳动者报酬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本期应付职工薪酬 - 上期应付职工薪酬;生产税净额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本期应交税费 - 上期应交税费);营业盈余 = 净利润。

④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 固定资产原值 - 固定资产净值。

⑤ 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利润 - 营业税金及附加。

式中, $control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λ_{it} 代表年份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同年份带来的异常影响; ε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2. 创新差异研究

(1) 变量选择

从微观层面看,鉴于上市公司年报信息公开特点,能体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除专利年申请量外没有更多披露,且大多学者使用专利申请(或授权)量^[31]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专利年申请量作为创新绩效(*innovation*)的代理变量。

(2) 模型建立

假定某个企业在 $t = 0$ 时期开始实行出口战略, y_{it} 表示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创新绩效。企业 i 在 t 期初次选择出口与假定其在 t 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所产生的绩效差可以表示为 $y_{it}^1 - y_{it}^0$ 。若 $(y_{it}^1 - y_{it}^0) > 0$,则表示相比较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企业 i 选择出口战略后,创新绩效提高得更多。反之亦然。借鉴 Heckman 等^[32]的逻辑和方法,本文定义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 i ,由于选择出口而获得的创新绩效的平均增加效应 ATT 可写为:

$$ATT = E\{y_{it}^1 - y_{it}^0 \mid START_i = 1\} = E\{y_{it}^1 \mid START_i = 1\} - E\{y_{it}^0 \mid START_i = 1\} \quad (2)$$

式(2)中, $START_i = 1$ 表示选择出口战略的企业。

由于 y_{it}^0 是不可观测到的,如何识别 $E\{y_{it}^0 \mid START_i = 1\}$ 成为估算 ATT 的关键。为此,本文采用由 Rosenbaum 等^[33]提出的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简称“SM 模型”)进行估算。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提出一个“反事实框架”(a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其基本逻辑是:以选择进入出口市场的样本企业为实验组,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企业为控制组,通过匹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样本企业特征值(可以由包含企业资产、职工人数等一系列变量反映),使得两组企业除实行的国际化战略不同外其他主要特征相似。此时,匹配之后的控制组

企业可以最大程度地替代实验组的“反事实” y_{it}^0 ,在此基础上计算的两组企业的创新绩效差异可归因于企业不同的国际化战略选择。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将影响企业不同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共同影响因素作为匹配变量 X_{it} (见表 2)^[34-36],运用 logit 回归计算概率值(见公式 3),也即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实现降维。

$$P(X_{it}) = \Pr(START_i = 1 \mid X_{it}) = E(START_i = 1 \mid X_{it}) \quad (3)$$

其实,根据倾向得分进行配对,并以有放回的一对一近邻匹配方法($n = 1$)作为配对标准。同时,用一对二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和核匹配进行敏感度分析,进而证明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将配对后的控制组企业创新绩效替代实验组创新绩效,计算平均增加效应 ATT,并对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standardized bias)进行平衡性检验。一般而言,标准化偏差绝对值不高于 10%,意味着匹配后的数据通过平衡性检验。

表 2 匹配变量设计

匹配变量	变量说明
企业规模(<i>size</i>)	对数企业总资产
利润率(<i>profit</i>)	利润总额占营业总收入比重(%)
企业偿债能力(<i>lar</i>)	企业资产负债率(%)
资本密集度(<i>capital</i>)	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取对数
企业年龄(<i>age</i>)	对数企业年龄(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生产率差异检验

图 5 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生产率的累积概率分布图。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累积概率分布位于出口企业的右侧,可以直观地判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总体高于出口企业。回归结果表 3 显示,在所有实行国际化战略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中,生产率越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生产率越低则越有可能选择出口。笔者分别通过增加解释变量、替换现有解释变量以及改变回归方程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基本结论未发生改变。

因此总体而言,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高于与出口企业,假设 1 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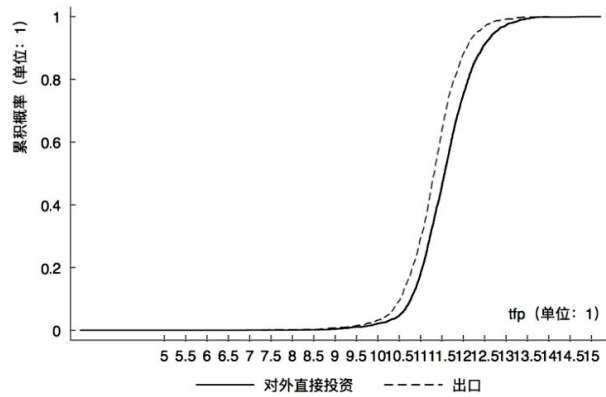


图5 累积概率分布

表3 回归结果

变量	strategy
<i>tfp</i>	-0.285 *** (0.0411)
<i>schale</i>	-0.253 *** (0.0249)
<i>age</i>	0.392 *** (0.0772)
<i>roa</i>	0.00787 (0.00491)
<i>lar</i>	0.00142 (0.00138)
调整后的 R^2	0.0532
观察值	4202

注: ***代表系数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里报告稳健标准误差;结果由 Stata14.0 生成。

(二)企业国际化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

根据 Rosenbaum^[33]的建议,本文选择“形式灵活的”logit 回归估计倾向得分,表4汇报的是各匹配变量的 logit 回归结果,匹配变量选择基本合理。根据有放回的一对一近邻匹配原理,计算平均增

表4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logit 回归
<i>size</i>	-0.6951 *** (0.0458)
<i>profit</i>	-0.0013 (0.0020)
<i>lar</i>	0.0054 * (0.0023)
<i>capital</i>	0.3809 *** (0.0457)
<i>age</i>	0.6793 *** (0.1322)
截距项	7.7615 *** (0.9947)
调整后的 R^2	0.0620
观测值	4202

加效应 ATT 的估计值为 -0.1391,对应的 t 值为 -2.15(见表5),且由自助法得到标准误为 0.06。因此,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企业的创新绩效高于选择出口战略的企业。

表5 两组企业的创新绩效差异

变量	匹配前/后	实验组	控制组	差异值	t 值
<i>innovation</i>	匹配前	3.1490	3.8451	-0.6961	-14.72
	匹配后	3.1604	3.2994	-0.1391	-2.15

图6显示的是两组企业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可以看到,根据一对一近邻匹配原则,在共4202个观测值中,对倾向得分重叠部分的观测值进行保留后,控制组中有26个不在共同取值范围(off support),占样本总数的0.6%,在合理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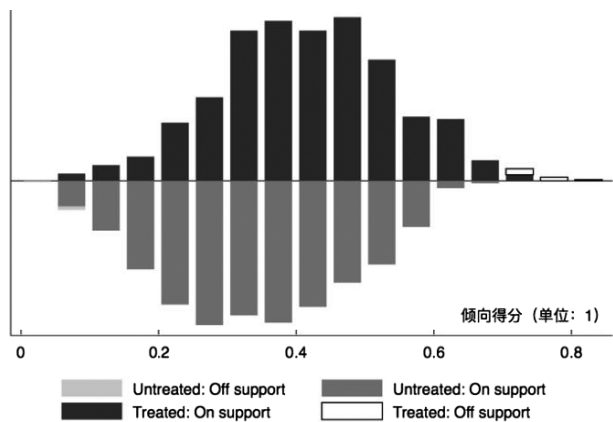


图6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进一步对匹配后的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绝对值都在4%左右,均有大幅缩小,且 t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基本无系统性差异,如表6所示。因此,匹配结果较好平衡了数据,基本通过平衡性检验。

为稳健起见,本文进一步运用一对二的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卡尺范围定为 0.01)和核匹配方法对结论加以验证,发现结论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出口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假设2成立。

表 6 匹配变量及平衡性

变量	匹配前/匹配后	均值		标准化偏差 /%	标准化偏差减小幅度 /%	t 值	p 值
		实验组	控制组				
size	匹配前	21.81	22.28	-46.7	97.3	-14.21	0.000
	匹配后	21.82	21.83	-1.3		-0.39	0.694
profit	匹配前	7.41	9.32	-9.5	99.6	-3.02	0.002
	匹配后	8.05	8.06	-0.0		-0.01	0.991
lar	匹配前	35.37	37.99	-14.2	82.3	-4.84	0.000
	匹配后	35.20	34.73	2.5		0.72	0.470
capital	匹配前	12.69	12.58	13.6	65.9	4.14	0.000
	匹配后	12.68	12.72	-4.6		-1.32	0.187
age	匹配前	2.90	2.88	7.8	77.1	2.42	0.015
	匹配后	2.90	2.89	1.8		0.50	0.618

五、结论与讨论

“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其次的选择出口,最低的选择内销”,这是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结论之一。本文以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这两种国际化战略为研究视角,以实行国际化战略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证明高生产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同时以知识流动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知识传递过程的分析,探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促进的差异。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比出口战略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然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给中国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国际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盈利可能主要来源于内循环,对外开放进程延缓,甚至面临海外市场的严重打压,但企业要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经济全球化依旧是历史潮流,企业国际化进程也终会回到正轨。无论实行出口战略抑或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都能促进企业创新。对出口企业而言,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但仍需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能

力评估,从出口战略逐渐过渡到到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循序渐进。

参考文献:

[1] VERNON R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66, 80(4) :190-207.

[2] JOHANSON J, WIEDERSHEIM-PAUL 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firm; four swedish cas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75, 12(3) : 305-322.

[3] JOHANSON J, VAHLNE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 8 : 23-32.

[4] JOHANSON J, VAHLNE J.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0, 7(4) :11-24.

[5]李春顶 . 出口贸易、FDI 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新一新贸易理论模型扩展及我国分行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9(2) :15-28.

[6]万源星,魏紫莹,王怡舒 .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吗[J]. 科学学研究,2022,40(5) :796-807.

[7]HELPMAN E, MELITZ M J, YEAPLE S R.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ous firms [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 94(1) :300-16.

[8]易靖韬 . 企业异质性、市场进入成本、技术溢出效应与出口参与决定[J]. 经济研究,2009,44(9) :106-115.

[9]唐宜红,林发勤 .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检验[J]. 南开经济研究,2009(6) :88-99.

- [10] 钱学锋,王菊蓉,黄云湖,等. 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8(2):37-51.
- [11] 李春顶,尹翔硕. 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J]. 财贸经济,2009(11):84-90,111,137.
- [12] 田巍,余森杰.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2,11(2):383-408.
- [13] 葛顺奇,罗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J]. 管理世界,2013(6):28-42.
- [14] 朱荃,张天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2015(12):103-117.
- [15] 周茂,陆毅,陈丽丽.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5(11):70-86.
- [16] FRENZ M, IETTO-GILLIES G. Th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the UK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J]. Research policy, 2009,38(7): 1125-35.
- [17] KOGUT B, ZANDER U. 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3(3):383-397.
- [18] SPENDER J C. Making knowledge the ba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45-62.
- [19] WANG K Y, QIN C, RAMBURUTH P, et al. Cultural distance and subsidiary roles in knowledge transfer in MNCs in China [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2(4): 260-280.
- [20] GHOSHAL S. Global strateg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7,8(5):425-440.
- [21] HILL C, HWANG P, KIM W. An eclectic theory of the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11(2): 117-128.
- [22] LEONARD-BARTON D. Core capability and core rigidity: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1): 111-125.
- [23] 巴克利,卡森. 跨国公司的未来[M]. 冯亚华, 池娟, 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31-56.
- [24] ZAHRA S A, GEORGE G. 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185-203.
- [25] 田巍,余森杰.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2,11(2):383-408.
- [26] 盛丹. 地区行政垄断与我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J]. 产业经济研究,2013(4):70-80.
- [27] 陈诗一. 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2008 [J]. 经济学(季刊),2011,10(3):735-776.
- [28] CHEN K, JEFFERSON G H, RAWSKI T G, et al. New estimates of fixed investment and capital stock for Chinese State industry[J]. China quarterly, 1988, 114:243.
- [29] 袁堂军.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研究[J]. 经济研究,2009,44(6):52-64.
- [30] 李春顶. 出口贸易、FDI 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新一轮贸易理论模型扩展及我国分行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9(2):15-28.
- [31] 陈红,张玉,刘东霞. 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9,22(3):187-200.
- [32] HECKMAN J, ICHIMURA H, SMITH J, et al.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 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64: 605-654.
- [33] ROSENBAUM P, RUBIN D.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1): 41-55.
- [34] 任曙明,张静. 补贴、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2013(10): 118-129.
- [35] 毛其淋,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J]. 世界经济,2014,37(8):98-125.
- [36] 毛其淋,许家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J]. 世界经济,2016,39(6):77-99.

(本文责编:默 黎)